

一个人和一个国家的命运

国家 拐点

Turning Points
of Countries

郝铁川 著

 人民出版社

Turning Points
of Countries

郝铁川 著

一个人和一个国家的命运

国家命运

 人民出版社

前言

一篇读罢头飞雪

我曾在大学讲授中国法律制度史达十年之久。毋庸讳言的是,不少本科学生不太喜欢这门课程。平心而论,学生对法史课程缺乏兴趣,并非市场大潮下学生的红尘功利之心使然,而是教材和授课者都没有把真实鲜活的法史告诉学子。就教材而言,本应含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人物、事件等丰富多彩的法律史,却往往成了单纯的中国立法史;从授课者来看,本应把任何一部法典、一条法律规则都放在历史的十字交叉点审读,融进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汇成的大河中解析,但在教学实践中大都成了茕茕子立的法律解释。

有感于此,我曾先后撰写了《中华法系研究》、《中国著名法官评传》和《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中国民间神研究》。《中华法系研究》着眼于思想与制度的结合以及立法、司法、守法三者的关系,提出了中华法系具有法典法家化、法官儒家化、民众法律意

识鬼神化的特点；《中国著名法官评传》着眼于一切法律最终是“法官法”和律的生命在于经验的理念，通过一系列案例分析，揭示中国古代的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泛道德主义和泛刑主义相结合的思维方式怎样在操作层面上妨碍了“依法治国”的形成。受学界对我提出的中国古代民众法律意识鬼神化颇感兴趣的鼓舞，我又撰写了深化这一命题的《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中国民间神研究》。

沿着这一思路，我的目光自然就到了政治家与法治关系的领域。如果说探讨法官与法治关系的论著已经汗牛充栋的话，专门研究历史人物（尤其是政治家）与法治纠葛的论著则寥寥无几了。法学是人学，法制史是人的历史。关于法学家、法官、律师等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在民主法治进程中的作用，学界颇多论述。但对政治家在民主法治进程中的作用，却鲜有专文探讨。政治家是掌握权力或拥有权威的人物，是一个社会的强势群体，而现代法律既要限制权力，又要依赖一定的权力运行程序来确立，更靠一定的暴力来执行。因此，政治家在民主法治中的作用不亚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理应得到充分的研究。因此，我就开始了本书的写作，形成了如下主要结论：

一、政治家的价值观与制度的形成和执行

民主法律制度是怎样形成的？有人认为是不同政治力量博弈的产物，有人认为是历史传统演变的结果，有人认为是立法者从人类的道德规范中筛选而成等等，不一而足。但我认为，政治家的价值观念是民主法制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人类历史上，美国第一个废除君主制、实行民主共和制；第一个实行联邦制度，用宪法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第一个以成文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制度；第一个完成了政教分离，把宗教信仰划入私人自主范围。这四个

史无前例的“第一”为美国三百多年的发展保驾护航，功不可没；对其他国家的制度建设影响巨大，世所公认。那么这四个第一是怎样被创造的？虽然答案多多，但大都绕不过华盛顿的价值观所起的作用。正是华盛顿拒戴王冠，甘为布衣，从而杜绝了君主制在美国的产生。正是华盛顿主持了宪法的制定，使人类首部成文宪法顺利降临。正是华盛顿支持了联邦党人，促成美国三权分立、联邦制和政教分离原则的确立。正是华盛顿具有高尚的品德，所以他既没有像英国克伦威尔那样从革命军的总司令演变成一个独裁者，也没有像法国的拿破仑那样利用自己的威望戴上皇冠。他的价值观阻止了旧制度的复活，推动了新制度的诞生，许多做法演变成了日后的规则。

过去我们常说因为防止人类之“恶”而构筑了法治篱笆，华盛顿的事迹则告诉我们人类之“善”也是法治之源。

二、政治家的学识与制度的形成和执行

有人把近代以来的国家历程划分为创建、建设和管理三个阶段，创建阶段主要依赖军事家，建设阶段主要依赖工程师，管理阶段主要依赖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人士。此论是否确当，暂且存而不论，但它至少揭示了一定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要求统治者必须具备与之相应的专业理论知识的道理。20世纪以前，华人社会长期被西方社会视为“脏、乱、差、贪、赌、愚”等人类劣性聚集之地，而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法律系的李光耀，将西方的法治传统和华人的德治传统有机结合，把新加坡建成了可以和西方花园国家瑞士相媲美的东方花园国家；用使人不能贪、不敢贪、不用贪和不想贪的体制、机制把新加坡建成了举世公认的廉政之国。而近代英国的克伦威尔由于知识贫乏、理论思维简单，没有承担起奠定英国近代国家管理制度基础的历史使命。

愚昧无法治。近现代的民主法制不仅理念方面与以前大相径庭,就其具体知识方面也比以前“约法三章”之类的法制复杂千百倍。发达国家的统治者和管理者多为法学专业之士,绝非偶然。法律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一代人必有一代人的治国方式。

三、政治家的经历与制度的形成和执行

政治家的能力、学识、性格等不仅与天赋有关,更与经历相连。解放战争初期,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作为党政一把手的邓小平,在艰难困苦和责任重大的环境中,性格一下子变得十分沉稳,少言寡语。他一生“三起三落”的经历,更使他形成了一种遇事不怒或含怒不激、不屈侮辱而又忍辱负重的钢铁般的意志风格,这对他晚年坚定不移地开创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影响至大。而反观戈尔巴乔夫失败的改革,则与其仕途一帆风顺、意志不够坚强有重大关系。

挫折有时会使人成熟,苦难有时会变成人的财富。没有必要的挫折,人不会聪明;没有一定的苦难,人只会浅薄。“少年得志大不幸”,不幸就在于缺乏历练和磨难,容易狂妄自大。成功需要机遇,更大的成功则需要挫折。与其说性格决定命运,还不如说经历决定命运。

四、政治家作用的大小取决于时代的变革或守成

时势决定英雄的命运。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在《伽利略传》一剧中设计了两句有名的道白,一句出自伽利略的一个门徒之口:“一个没有英雄的国家是多么不幸啊!”另一句是伽利略本人的回

答：“不！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呀！”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在新旧制度交替的革命年代和社会剧烈改革的动荡时期，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或许是不能缺席的。因为“春江水暖鸭先知”，真理开始时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历史常常是少数先知先觉者带动后知后觉者的过程。但在平静和守成的和平建设岁月，假若一切都能依法办事，扭转乾坤的政治家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因为法治是一种稳定而有序的和谐秩序，是一种普遍而平凡的生活方式。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并不是一个人有多大的才，历史就给他提供多大的舞台，而是历史有多大的舞台，你才能施展多大的才。变革战乱时期，常常是一个破旧立新或制度需要重大修正的时期，因此政治家的性格可以凸显，理想可以驰骋，学识可以运用。到了承平、守成（事物相对稳定）时期，政治家必须循规蹈矩，依照民主程序和法律规则治理国家，个性不可能像在变革、战乱年代那样张扬。试看当今西方许多国家的政党竞选纲领大都大同小异，竞选结果呈现为有规律的“钟摆效应”。这并非今不如昔，而是时代的特性决定了政治家的个性。

五、政治家事业的成败受制于法治公理 与本土资源的结合水平

宋代思想家朱熹说“理一而殊”，犹如“月印万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类历史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有机结合。抹杀统一性，不符合人类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否认多样性，则不符合人类历史不同于自然界规律的特殊性。与此同理，人类的民主法治必然具有适用于各个国家的公理性内容，同时，各个国家的民主法治又因国情的不同而具有自己的特殊性、阶段性内容。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麦克阿瑟“二战”后对日本天皇制度的改造和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之所以取得成效，就是因为他们把人类民主法

治公理同本国历史文化资源有机地相结合。

现代化并不等同于全盘西化,只有把西方民主中具有普适价值的内容与本民族固有的政治文化传统进行有机的“嫁接”,才能让民主在自己的国土上生根、开花、结果。而如果以战争的简单方式向别国押送民主,就会像美国在今日伊拉克那样,欲罢不能,欲干不成,风驰电掣地来,最终是灰溜溜地去。老杜威说过:“每一代人都必须为自己再造一遍民主,民主的本质与精髓,乃是某种不能从一个人或一代人传给另一个人或另一代人的东西,而必须根据社会生活的需要、问题与条件进行构建。”民主是一种时代性知识,又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政治家只有遵循这一规律,才能在民主法治现代化的事业中“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而当我写完这本拙著的最后一个字时,顿生“一篇读罢头飞雪”的感觉。政治家、历史人物在民主法治中的作用太重要、太复杂了。他们往往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拐点造就者:国家因他们不同的民主法制活动或走向繁荣稳定,或走向衰落动荡。经济发展有周期,政治发展也有起伏。

我坚信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但人民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其间有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不知不觉者,民主法治的事业就是通过先知先觉者带动后知后觉者、改造不知不觉者进行的。杰出的历史人物就是先知先觉者,他们是散落于民间的创新智慧的集大成者,他们的美德往往是先进制度形成的源头活水,他们的行动常常是先进制度确立的临门一脚。制度是怎样形成的?法官审案的重要规则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我们不应该到那些未必是职业法学家的杰出历史人物的智慧中寻找吗?

我坚持善人应有善报、恶人应有恶报的古老信念,但通过对希特勒法西斯罪恶行径的剖析,却让我感到一个民族的大恶人的出现,固然与其恶劣品质密不可分,但又与这个民族的某些劣根性和

这个国家的某些制度缺陷息息相关,这个大恶人的出现或许是这个民族除却劣根性所要付出的必要成本。制度是怎样失灵的?难道我们不应该从统治者的唯意志论和民众的宿命论的交响曲中去玩味吗?

美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说过,满足欲望的历史,就是财富拓展的历史。其实,法律拓展的历史也是情理欲杯葛的产物。过去我曾说过,一切法律问题最终都是法律文化问题,一切法律文化问题最终都是法律思维方式问题,一切法律思维方式问题最终都是从对人性的善恶的预设判断问题出发的,一切人性善恶的预设判断问题最终都根植于人们的经济政治关系。民主法治就是各种善恶理念及其实践碰撞的结果,而表象背后则是经济利益关系的翻腾不息。本书落笔之际,我更坚信此论。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多年来能够进行一些业余写作,全靠一些朋友的热情相助。在这里,我要诚挚地向为本书写作和出版给与鼎力支持的李春林、朱大建、严建平、周延召、郑惠坚、陈闽、茜尔维亚、李岱岩、麻素光、周涛勇等仁兄深表谢意。特别是作为本书责任编辑的春林兄,是我近年来所遇到的为数不多的忠诚学术的真人,他对读者的那种虔诚之情,使我屡屡沉吟“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茜尔维亚给我介绍了国外大量的最新研究成果,无数个越洋电话更使我深感“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朋友们,你们使我活得更充实;我将回报你们以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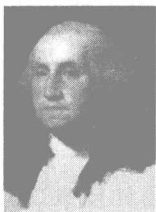
目 录

前言 一篇读罢头飞雪	1
华盛顿:奠基美国	1
美德催生新制度	1
监督使他更伟大	4
拿破仑:从民主战士到封建皇帝	8
从激进的民主战士到专制的短命皇帝	8
充满个性的民法典	12
谁给他戴上皇冠	15
他与女人	18
林肯:废除黑奴制度的背后	22
追求情、理、法的统一	22
不忘法治的终极关怀	26
俾斯麦:“铁血”统一德国	33
面对民主与机遇的冲突	33
鞭子和糖果	39
晚年的醒悟	45

罗斯福:复活美国	53
民主决定民生	53
当改革遭遇“黑色星期一”	57
尊重民主绝非盲从多数	59
丘吉尔:“保卫人民有罢免我的权利”	63
民主需要绅士	63
民主成全美名	68
甘地:摆脱奴役的第三条道路	75
摆脱奴役的又一条道路	75
和“不可接触者”接触	83
以绝食祈求和平	88
希特勒:是什么把他推向罪恶	98
德国人民的错误选择	98
制度防线的悲哀	108
从民族优越论到种族屠杀	115
如果没有忘记人类共同利益	128
麦克阿瑟:再造日本	138
把天皇拉下了神坛	138

英雄的舞台	145
肯尼迪：重建美国	154
选举的理性与非理性	154
第二次解放宣言	166
“和平是一个过程”	173
李光耀：德、法兴邦	181
铁腕护廉洁	181
有冕之王与无冕之王	185
以提高工资促进产业升级	188
社会保障的是勤奋	191
引争议的婚育观	194
把民主之根留住	198
德、法两手除陋习	201
戈尔巴乔夫：断送苏联	205
沉默的巨变	205
葬送苏联的激进改革	213
何以抛弃苏共	221
经历决定命运	232
主要征引书目	238

华盛顿： 奠基美国



美德催生新制度

在人类历史上,美国第一个废除君主制、实行民主共和制;第一个实行联邦制度,用宪法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第一个以成文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制度;第一个完成了政教分离,把宗教信仰划入私人自主范围。这四个史无前例的“第一”为美国二百多年的发展保驾护航,功不可没;对其他国家的制度建设影响巨大,世所公认。那么这四个第一是怎样被创造的?虽然答案多多,但大都绕不过华盛顿的美德。

正是华盛顿拒戴王冠,甘为布衣,从而杜绝了君主制在美国的产生。1782年5月,时任大陆军总司令的华盛顿收到了军队中一位老部下的来信,力劝他登基称王。这绝非空穴来风。独立战争

打响之后，华盛顿受命于危难之际，以弱抗强，战功显赫，被北美人民视为救星、奉若神明。军队对中央政府软弱涣散、不能及时解决军饷极为不满，更是强烈要求华盛顿担任国王。环顾世界，东方是君主专制的天下，西方也依然眷恋君主制度。德意志、俄罗斯和法国仍然是封建君主把持朝政，资产阶级掌权的英国虽然绞死了查理，但又从荷兰请来了威廉。北美 13 个殖民地的最高统治者是英国国王，“忠于国王”的观念根深蒂固，如果华盛顿戴上王冠，人们会视之当然。尤其是他有军队的强力支持，登上王位易如反掌。

但华盛顿坚信民主共和思想，反对君主统治。他立即回信拒绝了老部下的请求：“先生，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在战争进程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像你所说的军队中存在的那种想法更使我感到痛苦。我不得不怀着憎恶的心情看待并严厉斥责这种想法……我很难设想我有什么行为竟会鼓励你写这样的一封信，在我看来，这封信包含着可能降临到我们国家头上的最大危害。……如果你重视你的国家，关心你自己或者子孙后代，或者尊重我，那么，我恳求你，从你的头脑里清除这些思想，而且绝不要让你自己或者任何别人传播类似的看法。”

正是华盛顿拒绝总统终身制，开创了总统任期不过两届的先例，捍卫了官员实行限任制的民主原则。根据 1787 年宪法，美国总统每任 4 年，但并无限制连任的次数。这就意味着，只要条件具备，总统一直可以连选连任。由于华盛顿高尚的品德、卓越的才能和崇高的威望，像杰斐逊这样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也一度相信华盛顿这位第一任总统可能任职终身，但华盛顿却没有这样做，他的至多连任两届的先例后来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罗斯福之后又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成为一项制度。

正是华盛顿主持了宪法的制定，使美国有了立国之本。他担任了费城制宪会议的主席，确立了议事规则，主席台上他依章办事，寡言少语；主席台下他周旋于每个代表之间，为代表之间的相

互沟通营造氛围。由于与会者中许多人曾是独立战争时期他的老部下,或在他的弗农山庄蒙受过殷勤招待,甚至许多人虽未见过他也为其威望所折服,所以华盛顿常常能在他们中间起到平衡、协调的作用。例如,当代表们为参、众两院的名额争执不下时,他立即主张放弃原来的观点,将参议院的名额改为大、小州一律平等。他向麦迪逊说,这样做可以换取他人在其他问题上的让步,有利于整个宪法的通过。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当有某位代表提出众议院代表应由4万人产生一名改为3万人产生一名时,华盛顿恐怕因此再起争执而影响宪法的通过,遂起而表示,希望大家赶快通过这一提案。结果,“因大家都希望以华盛顿的愿望行事”而一致同意了这一方案。

正是华盛顿支持了联邦党人,促成美国三权分立、联邦制和政教分离原则的确立。费城制宪之前的美国实行的是每个主权独立州结盟的邦联制,各州之间政体和政教关系不尽相同。制宪会议之前,华盛顿就与联邦党人麦迪逊书信探讨过这些问题。制宪会议召开之初,麦迪逊设计的方案得到了华盛顿等弗吉尼亚代表的支持,并被作为“弗吉尼亚方案”在大会上提出。华盛顿知道,要使代表们接受这一方案具有很大的风险。因为它要摆脱邦联条例的束缚,削弱各州的权力,遇到反对意见势所难免。但是他认为必须这样做:“我们提出的方案很可能一个也通不过,也可能会发生激烈的论战。假如为了迎合所谓的民心,我们提出一些连我们自己都不赞成的提案,以后我们怎么能保证自己的工作呢?我们应该制定一个可供聪明正直的人们修改的方案,结果如何,全在天意了。”经过一番讨论,这个方案虽然作了不少修正,但联邦制、三权分立、政教分离等基本原则被采纳了。

联邦制虽然确立了,但因长期以来美国是有邦无国,州自为政,州长就是最高行政长官。在一些人眼中,州长、总统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华盛顿建立了新规矩,联邦政府应居于各州政府之上。

华盛顿在一次出巡进入马萨诸塞州时,该州州长亨科克故意称病不出来迎接。华盛顿不甘示弱,他以拒绝出席州长宴会加以回敬。终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强硬态度压倒了亨科克的地方主义气焰。亨科克致函华盛顿,对不能及时出迎总统表示歉意,并请求会见。得到批准后,亨科克乘马车冒雨来到华盛顿下榻之处,拜会总统阁下。

正是华盛顿具有高尚的品德,所以他既没有像英国克伦威尔那样从革命军的总司令演变成一个独裁者,也没有像法国的拿破仑那样利用自己的威望戴上皇冠。他的美德阻止了旧制度的复活,推动了新制度的诞生,许多做法演变成了日后的规则。现代法治不是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防恶过程中趋于完善,就是在身先士卒的榜样示范过程中百炼成钢,善和恶共同推动着法治的进程。

监督使他更伟大

1799年12月13日,华盛顿因为偶感风寒,病逝于他的弗农山庄。亨利·李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悼词中,称华盛顿为“战争时期的第一人,和平时期的第一人,同胞心中的第一人,一位举世无双的伟人。”华盛顿离开尘世已有二百多年了,迄今为止公开的每种资料,都无法推翻对华盛顿这样的评价。1956年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在谈到中国也要建立领导干部任期制时,都以华盛顿为例,说明资产阶级政治家尚能废除终身制,共产党人则更应如此。

他是一个克己奉公的军人。在被推举为大陆军总司令时,他做出了这样的承诺:“至于薪饷,我请求允许我向会议保证,由于促使我接受这一艰巨重任,牺牲自己家庭的安适和幸福的,并不是任何金钱上的考虑,我不愿从薪饷中得到任何好处。我将专立账目,准确载明我的一切花费。”战争结束后,财政部的审计员核对

了战争期间记在华盛顿名下的账目，一共是 140500 英镑，每张账单都有华盛顿的签名，用途清晰，数字精确，这些钱款都是在战争期间直接花掉的，并不包括大陆会议所欠的华盛顿的薪饷。从战争爆发直到他卸下总司令职务为止，他没拿过一分钱的薪酬，反而从自己腰包里掏了不少钱，完全兑现了他过去的诺言。

虽然他不担任总司令了，但人们仍然没有忘记他，络绎不绝地到弗农山庄拜访他。宾州议会觉得这会在经济上给他带来很大负担，便建议国家拨笔专款送给华盛顿，让他修缮一下山庄。这同样被他拒绝了，在他看来，能够牺牲个人私利为国家作贡献，是一个公民的荣幸。弗吉尼亚会议鉴于华盛顿调解该州与马里兰州水务纠纷有功，便把两家公司的 150 股（总计 4 万美元）送给他，而他很快将这笔钱捐给了一些从事公共教育的学校。

他是一个任人唯贤的总统。一位老部下的夫人致函华盛顿，请求能为在战争中身负重伤的丈夫谋得一官半职。他富有人情味地回复道：“作为个人，我的感情将迫使我竭尽全力弥补这一不幸。但作为一个只能为公众利益而行动的公职人员，我必须抛弃个人的好恶和愿望，来决定我职责中的每一具体事项；我必须根据所能了解到的最详尽的情况，并经过对一个人的品格和具体条件的总的判断，然后推荐出我认为最能胜任的人到那个部门去。”他既而表示：“在做出决定之前，夫人，我请您相信，无论结果如何，除了公众利益以外，我没有其他考虑。”有一次，他的侄儿布什罗德·华盛顿希望当总统的伯父能为其安排一个检察官的职位。华盛顿立即予以回绝：“千百万双人的眼睛正注视着我，为朋友或亲戚提供被人视为特殊化的过失将无一能够遮掩过去。”

他是一个能上能下的政治家。华盛顿一生三进三退：从大陆军总司令到退隐于弗农山庄，这是他一进一退；从主持制定宪法并连任两届总统到退隐于弗农山庄，这是他二进二退；从亚当斯总统任命他为美军中将总司令，紧急处理与法交战事宜，到后来美法关